

刘建军长篇小说研究的理论架构与批评实践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ritical Practice of Liu Jianjun's Study of the Novel

杨丽娟 (Yang Lijuan)

内容摘要: 刘建军《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将西方长篇小说艺术演进过程概括为三大基本结构模式：流浪汉小说式、巴尔扎克小说式与意识流小说式。该书从演进论、构成论与机制论三个方面，对以上模式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释，为长篇叙事作品的研究与创作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有效的批评方法。该理论立足于文学作品实际，围绕上述三大结构模式，融汇文学形态、叙事手法、创作方式、文论思想、社会形态、思维模式、认知心理、经验传承、文化取向等多重知识系统，体现出整体性与综合性的批评理念，进而推动了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的更新。

关键词: 《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流浪汉小说式；巴尔扎克小说式；意识流小说式

作者简介: 杨丽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文学和西方文论。本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希腊化’时期文学经典文献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22&ZD293】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ritical Practice of Liu Jianjun's Study of the Novel

Abstract: In his work *On the Structural Models of Western Novels* (1994), Liu Jianjun summarizes the artistic evolution of Western novels into three fundamental structural models: the "picaresque novel," the "Balzacian novel," and the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volutionary theory, compositional theory, and mechanistic theory, he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these three structural models, offering innovative narrative theory and effective critical methods for the study and creation of long-form narrative works. Grounded in the actualities of literary works and centered around these three structural models, Professor Liu's theory integrates knowledge systems such as literary forms, narrative techniques, creative methods, literary theory, social structures, thought patterns, cognitive psychology, experiential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orientations. This approach highlights a holistic and comprehensive critical

philosophy, thereby renewing the methodology for novel research.

Keywords: *On the Structural Models of Western Novels*; picaresque novel; Balzacian novel;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

Author: Yang Lijuan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3, China), with a specialization in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mail: ljlljl@163.com).

小说堪称西方文学中成就最为卓著的文学类型之一，而长篇小说更是其中分量最重的一脉。纵观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著作与外国文学史教材，长篇小说始终是文艺复兴以来文学发展的主体内容。一代代学者通过译介与研究，不仅为相关领域培养了人才、普及了外国文学知识，也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西方文学理论如潮水般涌入，建构符合历史实际的新外国文学史观，推出适应新研究语境的外国文学史教材，成为整个学科的迫切需求。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刘建军完成了其西方长篇小说研究课题，出版了《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论》¹一书。该书系统梳理并阐述了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的演变历程，将其归纳为“流浪汉小说式”“巴尔扎克小说式”和“意识流小说式”三种模式。²其“穷本溯源，取精用宏”（栗果 279）的视野与架构，赢得了学界的高度评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该书出版之际，国内西方长篇小说的研究成果——无论是译著还是专著——仍属寥寥。当时已出版的重要译作包括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等，而对戴维·洛奇（David Lodge）、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及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等人小说研究成果的集中译介，则要等到《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论》出版数年之后才陆续出现。³

一、继往开来：小说研究谱系的接续与开新

追本溯源，中国学者对外国小说的译介与研究，始于 1898 年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学人亦高度重视小说研究。其时，时代巨变当前，中国学者迫切需要以一种整体性视野审视古今中外，厘清自身所有与所缺。同是 1898 年，梁启超于日本横滨《清译报》发表《译印政治小

1 《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论》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于 1994 年出版，修订版改名为《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本文有关刘建军长篇小说研究的引文均出自刘建军：《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下文将简称为《模式研究》。

2 这一理论框架最早出现在作者 1990 年发表的论文中。参见刘建军：“西方长篇小说的三大结构模式概说”，《东北师大学报》2（1990）：91-96。

3 此类成果较为丰富，影响较大如译文集《小说的艺术》。参见乔·艾略特等：《小说的艺术》，张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

说序》，该报同期连载其译作《佳人奇遇》。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他明确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316），并倡导“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320），由此正式发起“小说界革命”。

此后不久，鲁迅等人为中国小说研究开辟了文学史的新路径。《中国小说史略》原为其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院校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自1920年起油印编发，1923年至1924年间分上下两卷出版，凡二十八篇。鲁迅承继清代学者从乡土文献入手的治学传统，自1909年归国至1920年夏，历时十余年潜心从事古籍辑校等工作，完成了《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岭表录异》等作品，《中国小说史略》正是其基于这些成果的厚积薄发之作。在该书序言开篇，鲁迅即断言“中国之小说历来无史”（《中国小说史略》2）。这一斩钉截铁的论断，并非为彰显个人创见，而是源于他对中国文学研究中史学维度长期缺失的敏锐觉察，亦体现其秉持“中道”、会通中西的学术追求。正如其在1908年《文化偏至论》中所主张：“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56）。

值得欣慰的是，无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是同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者在小说研究领域大体与西方学界保持同步，甚至时有超前，形成了与之呼应或别开新局的学术气象。例如，鲁迅出版《中国小说史略》三四年之后，福斯特（E. M. Forster）方在剑桥进行关于小说艺术的系列演讲；而当刘建军等中国学者展开小说结构模式研究之际，戴维·洛奇也正陆续发表其关于小说艺术的系列短文。¹然而，中国学者对小说发展脉络的梳理与溯源，往往显得比西方学者更为迫切。这或许因为，西方学界关于自身古今关系的认知体系和话语建构，早在19世纪现代古典学奠基与发展过程中已基本完成；而中国则在相近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剧烈的断裂与转折。至20世纪，如何接续传统、参照未来，以古鉴今、洋为中用，已成为再也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正因如此，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主张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实则为中国的小说研究奠定了双重基调：一是重视小说的社会功用，二是强调小说的历史传承。

上述两次中国小说研究的高峰，既是中西学术交汇的产物，亦彰显了中国学者自强求新的自觉。尽管分处世纪两端，二者关注的核心议题却高度相似。更准确地说，无论针对古今还是中外的小说研究，皆须以小说的基本属性与核心问题为客观对象与思辨锚点，并围绕以下几类共通议题展开：其一，是概念的界定——何谓小说？小说涵盖哪些作品？其文体渊源起于何时？其二，基本构成要素和总体特征为何？其三，发展演变的脉络与普遍规律如何？几乎所有从事小说研究的学者都深谙其难度，而长篇小说更以其丰厚的内容、独特的表现

1 《小说的艺术》是1991-1992年在报刊上连载的文章的总称，包括“开局”“书名”和“动机”等篇目。参见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

力,以及庞大的篇幅与体量,成为小说研究中尤为关键且任务艰巨的领域。因此,选择恰切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成为确保研究有效性的关键。

尽管多数学者承认,小说研究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但“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所拥有的几乎全部的小说诗学”(罗伯特·休斯 94)。《模式研究》因聚焦于小说艺术形式,尤其是结构层面,容易被简单理解为对结构主义与形式主义理论的直接应用。而这两种理论,如同其他西方文论流派一样,各有其优势与局限,读者也容易由此先入为主地推想《模式研究》可能存在的不足。事实上,正是基于对长篇小说研究之难与既有理论方法之限的深刻洞察,刘建军在《模式研究》中自觉遵循了内容与形式相统一、静态与动态相统一、构成特征与审美效应相统一、内部与外部相统一的研究原则,对西方长篇小说进行了宏观而立体的综合考察,从而将长篇小说研究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推向深入。因此,它并非对西方文学理论的简单诠释或套用,而是力图在古今、中外、新旧等多重张力中探寻新的批评范式,这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的学术精神一脉相承。可以说,该著作既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小说研究走向理论化与丰富性的标志,也是对鲁迅等人所开创的小说研究范式的继承与发展。

《模式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同时完成了三重任务:文学史观的奠定、理论话语的建构,以及批评实践的师范。其宏观整一的史观视野、形质兼顾的理论方法,以及灵活多元的文本分析,为中外小说——尤其是西方长篇小说研究——提供了积极而重要的推进。以此著为起点,刘建军开启了大半生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体系化、完整化而孜孜耕耘的学术道路,其间贯穿的宏观视野与创新意识,始终如一。本文通过对《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学术思想与论证逻辑的梳理与阐发,旨在帮助学界更深入地认识其在小说研究谱系中的价值与意义,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在各相关研究领域的借鉴作用与学术效能。

二、宏观整一的文学史观

进行西方长篇小说研究,首要步骤在于对核心概念的界定与梳理,这亦是所有文学论述的起点。诸多重要理论家都曾尝试界定长篇小说并分析其特征,以“复调”理论闻名的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便是其中之一。他曾指出:“研究作为一种体裁的长篇小说特别困难”(转引自《小说的艺术》107)。在他看来,在大型文学体裁中,长篇小说缺乏一套固定准则,也未形成稳定的体裁骨架,因而其发展的全部可能性难以被预先界定。巴赫金梳理了长篇小说的渊源,总体认为长篇小说与其他文学体裁始终处于某种体裁之争中。当长篇小说占据主导地位时,整个文学领域便常弥漫着体裁的批判态度,而其他体裁亦或多或少呈现出长篇小说化的倾向。¹在《模式研究》中,刘建军同样将长篇小

¹ 参见巴赫金:“史诗与长篇小说”,乔·艾略特等:《小说的艺术》,张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07-110页。

说的渊源追溯至古希腊，援引希腊当代作家科·阿西马科普洛斯的观点，认为古希腊神话传说可视为希腊小说的雏形。¹由此，西方长篇小说可以划分为原始长篇小说和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此外，刘建军也提及别林斯基的论断，即长篇小说是时代的史诗，囊括了史诗类别与本质的一切特征。²

可见，看似为人熟知的长篇小说，在理论界定上实则众说纷纭。然而，刘建军在《模式研究》中并未过度纠缠于概念的复杂性。这或许是因为，距离巴赫金探讨小说与史诗之关系已逾半个世纪，西方长篇小说已发展得更为成熟；抑或因为巴赫金对长篇小说体裁复杂性的论述，本就揭示了该概念所具有的宽泛性与灵活性。无论具体如何界定，长篇小说的价值几乎已成为共识。

《模式研究》的研究对象还涉及另一个需厘清的概念——“西方”。刘建军指出，书中所指“西方”是由欧洲与美洲大陆共通构成的文化世界。因此，西方长篇小说涵盖西方各国、各民族创作的全部长篇小说作品。他将研究重心放在西方，是因为较之东方，西方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更为突出。基于以上认识，刘建军将西方长篇小说的演进过程及人们对其中美感内涵的认识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诞生初期，写作与阅读以满足“讲故事”与“听故事”的基本需求与心态为主；随后，对社会生活的反应与典型人物的刻画成为长篇小说的核心，其审美也从纯粹娱乐转向社会价值；而至20世纪以来，西方长篇小说则更加着力于自身形式的变化和叙事技巧的革新。

在“演进论”一编中，刘建军系统梳理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学叙事传统的发展脉络。他指出，希腊神话和史诗的结构已经呈现出以一个人物为中心情节线索，并通过其直线型运行来统筹全篇的漫游式结构。古罗马神话与史诗进一步扩大了叙事规模，结构也更为严谨。至中世纪，欧洲叙事文学的故事情节线索由繁趋简，结构布局中对多线索的交织、伏笔与戏胆等技巧的运用则更加自觉和鲜明。现代意义上的西方长篇小说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其发展演进大致历经三个阶段：17世纪至19世纪20年代，作品多采用以单一主人公经历为主线、串联众多故事的直线型叙事；19世纪中后期，长篇小说普遍转向多情节线索的复杂结构，并着力塑造典型人物性格；至20世纪，故事趋于解体，情节淡化，作品常缺乏明显或完整的情节线索。正是在这一艺术流变的过程中，诞生出了西方长篇小说三大基本结构模式，即流浪汉小说式结构模式、巴尔扎克小说式结构模式和意识流小说式结构模式。这种演进式文学史观，本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强调文学在社会历史动态发展中受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制约，并随时代变迁而演变。同时，对结构模式递进式过程的描述，也契合了文学发展具有自身相对独立性的规律。

梳理西方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本身即是一种文学史书写，其艰巨性不

1 参见刘建军：《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2 参见刘建军：《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页。

言而喻。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曾刻意回避从整体文学传统的视角考察小说。他把小说看作虚构的、具备一定篇幅的散文，并认为文学传统是介于文学和历史之间的边缘地带，装备精良的评论家可以在其中长久徜徉，以此增强他们的判断力。但他亦坦言，真正具备如此学识的学者凤毛麟角，而伪学者虽可模仿其方法，却往往缺乏相应的学理储备。福斯特谦称自己属于后者，并未倚重精密的学术架构，也因而认为科学原则与传承系统在小说研究中难以完全适用。¹ 福斯特的清醒与谦虚令人欣赏，而鲁迅的敏锐与无畏则令人敬佩。福斯特采取了与福斯特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为中国学者的小说研究树立了典范。《中国小说史略》将小说类型的演进作为中国小说史叙述的重点，其中蕴含的小说史意识，使小说史研究摆脱了作家作品点评的传统方式，走向综合性的整体把握。² 因此可以说，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是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开始的。鲁迅开启了中国学界小说史研究的百年学术传统。

刘建军的《模式研究》继承并发展了鲁迅宏观整一的文学史观，将这一视角迁移至西方长篇小说研究，并基于西方文论的新近成果进行了综合创新，既突出了历时演进，也兼顾了内容与形式等共时维度。《模式研究》写作与出版之时，正值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热情高涨，相关译介与成果为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基础。刘建军以结构模式为线索对西方长篇小说进行文学史意义上的统揽与评析，虽难以一举穷尽所有问题，却对该领域研究贡献卓著。

事实上，优秀的研究往往殊途同归。无论纵向梳理还是横向剖析，无论侧重内容还是形式，最终皆需兼顾多方维度，方能达成有力的批评效果。任何视角都难免其局限，福斯特所选路径亦非无懈可击。每一次学术尝试，皆为不完美却充满勇气的壮举。刘建军宏观系统的研究视角，对于理解传统长篇小说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长篇叙事在艺术形式乃至精神内涵上的根本差异，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并为其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演进的诗化人学》³ 秉持同一文学史观，且表述同样清晰明了，只是侧重点转向文学的思想内涵。二者宛若一体两面，分别凸显了西方文学的结构模式与人文精神。此外，他在文艺复兴研究和拜占庭文学研究等艰深领域，亦展现出广阔的视野与卓越的理论建构能力，将社会历史批评与叙事学等多种理论方法运用得灵活自如，已达“法无定法”之境。

三、形质统观的理论体系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文学理论仍主导着外国文学研究的话语，“结构模式”这一提法极易让人联想到结构主义。刘建军选择从该角度切入西方长篇小说研究，本身就体现出对艺术形式的侧重。因此，要准确理解《模式

1 参见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小说面面观》，杨蔚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0页。

2 参见陈平原：“论鲁迅的小说类型研究”，《鲁迅研究月刊》9（1991）：30-40。

3 参见刘建军：《演进的诗化人学》，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98年。

研究》的理论体系，必须首先厘清它与同样重视艺术形式的结构主义文论之间的关系。

罗伯特·休斯（Robert Scholes）曾对结构主义做过详尽的研究。他认为，从根本上说，结构主义是在事物之间的关系而非单个事物内部寻找规律的方法，一定程度上是对20世纪学科分化状态的回应。这种分解促使众多学者从整体角度建立研究原则，在哲学、心理学、文学等多学科引发广泛探讨。而在文学领域，俄国形式主义、原型批评、符号学批评及人类学研究等均属此类。以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普洛普和斯特劳斯为例，二者均按故事发展顺序拆解作品，将反复出现的要素确立为功能单位，其组合模式即构成所谓“结构”。尽管罗伯特·休斯认为结构主义与阐释学并非对立，而是互补，能通过客观分析揭示作品的多重意蕴。¹然而，结构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文学形式与内容，这一局限是不争的事实。

与上述理论不同，《模式研究》虽以结构为核心并突出形式规律，却更强调文学的综合性与整体性。刘建军认为，结构是文学作品各要素的整体组织，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结构模式则是具体结构形成的相对稳定形态，具有揭示艺术规律的作用。因此，对西方长篇小说的研究，本质上是整体性的综合研究。²遵循这一准则，刘建军从演进、构成与机制三方面，全面系统阐释了西方长篇小说的三大基本结构模式。该论著视野宏阔，见解深刻，既衔接国际前沿成果，亦自成系统理论架构，实现了理论创新，为长篇叙事的研究与创作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有效方法。“构成论”作为全书核心，对每种模式均从构成及特征、构成规律、艺术效应与成因考察四方面展开详细分析，并探讨了它们的变异形态。

“流浪汉小说式”又称“串珠式”，是西方长篇小说的最初结构。它以主人公的活动足迹和经历为情节主线，串连起多个完整而生动的独立故事，在审美上兼具浮雕式、漫画式、长幅画卷式与平凡化艺术效应。人物性格单纯突出且一成不变，不平凡的性格与传奇故事，恰恰反映了当时社会表面离奇、实则停滞的生活状态。作品在夸张简洁的描绘中蕴含深刻思想，众多场景通过中心线索构成一幅丰富的生活画卷。这种结构完整和谐、匀称有序，但也不免呆板单一。“流浪汉小说式”结构，既是自然经济解体后个人勇敢而盲目地探索世界的认知反映，也发展了以个人遭遇为核心的欧洲叙事传统。

“巴尔扎克小说式”又称“网状”结构，通过多情节线索与矛盾交织呈现社会生活的“断面”，具有长卷风俗画式与戏剧化艺术效应。作品着力呈现复杂的社会环境与人物关系，善用“集中”“突转”“发现”和“戏眼”等戏剧技巧。该结构既是工业革命后人们依靠思维而非亲身经历来把握现实

1 参见 罗伯特·休斯：《文学结构主义》，刘豫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3页。

2 参见 刘建军：《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页。

的认知反映，也推进了截取生活断面并以多线索交织推进的叙事方式。它体现了社会现实的纷繁复杂及其可把握性。

“意识流小说式”亦称“蛛网式”，反映了现代主义小说在结构上的共性。传统情节线索被意识流动的轨迹所取代，生活场景被打碎，碎片在思绪中重组，形成亦真亦幻、光怪陆离的艺术画面，具有现代立体绘画式、迷宫式与哈哈镜式艺术效果。作品交织着多重意识、场景与意象碎片，结构如迷宫般引导读者从迷惘走向豁然开朗。这种混乱荒诞的画面，正是扭曲的现实与心理的投射。该结构是20世纪西方独特社会现实与非理性认识的艺术反映，也是对传统模式的反向借鉴。它深入主观与潜意识世界，失去了网状结构的清晰筋骨。

刘建军进一步指出，三种基本模式各有其变异形态：如流浪汉小说式有顶接串珠式、瓜蔓式和串珠与网状混合式等变异；巴尔扎克小说式衍生出编辫式和多扇屏风式；意识流小说式则对应拼板式。所有变异皆源自三大母体模式，是基本模式相互影响与整合的产物，体现了文学观念的嬗变与审美能力的发展。

在机制论中，刘建军从内外两方面探讨结构生成。内部机制关注结构生发点、结构线及动力形式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外部因素则涉及叙事视角与时空观念。有限视角配合物理时间和延续性空间，易形成流浪汉小说式结构；全知视角配合对并置性空间的体验，趋向巴尔扎克小说式结构；而内外分身式的全知视角配合心理时间和交错扭结性的空间，则亦催生意识流小说式结构。

由此可见，刘建军的结构模式分析具有两方面显著特点与优长：其一，三大模式的概括在理论上更为抽象，呈现出作品情节发展总体格局与架构，其历时性演进观照与共时性模式研究形成了平衡；其二，它强调每种结构对应一种思维方式，其由简至繁、从有序到无序的演进过程，是对不同社会历史与认知方式的适应性表达。这使得《模式研究》与结构主义形成了明显区别，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其局限。

四、深入微观的批评实践

由于侧重小说形式研究，《模式研究》除易被视为结构主义的应用外，也常被等同于形式主义。形式主义的优缺点同样显著：它长于文本细读，最佳研究对象限于短篇作品或长篇中的修饰性细节；但形式主义的方法基本上是共时的，难以处理文学史或作品内部中的历时发展。换言之，形式主义精于具体品鉴，却在内容阐释方面局限明显。

与形式主义不同，刘建军的结构模式研究并未消解具体作品的思想内涵，社会历史批评等方法始终在场，宏观理论架构以坚实的细部探究为支撑。由此，《模式研究》既通过注重演变过程、避免观念先行以规避结构主义之弊，又

以深入的思想解读弥补形式主义之短，在具体作品中发掘意义并关联外部思想体系，实现了结构主义与阐释学的结合，总体上超越了两重侧重形式的局限。换言之，《模式研究》以宏观整一的历史观、共时性的结构模式与具体作品阐释，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有机系统，最大程度避免了单一研究模式的片面性，实现了从文学类型到作家作品、从一般规律到具体情况的综合研究，从而较好地达成了研究目的，既贡献于学术，亦为阅读与创作提供指引。

方法论的更新带来对既有结论的突破，西方长篇叙事传统中的若干重要现象由此获得新解，以下略举数例。

关于罗马文学，旧有观点认为其神话基本沿袭希腊，且未产生真正的民间史诗。刘建军研究发现，罗马神话中诸神的职能已发生重要转变，主神地位凸显，以其为中心的神话体系比希腊神话更加完整缜密，叙事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和严整，结构的有机性和布局的严密性更为自觉和加强。同时，罗马晚期神话中的若干传说已具备人民史诗的要素。从奈维乌斯到维吉尔，罗马完成了从个体史诗向体系史诗的转变。结构上，《埃涅阿斯纪》比修订后的荷马史诗更为浑然一体；《变形记》以“变形”为想象线索开创叙事新艺术；佩特罗尼乌斯的《萨蒂利孔》以主人公安柯皮尔乌斯的流浪活动为中心，首创了类“流浪汉小说式”结构，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则以篇幅宏大、场景广阔和结构缜密，在古代长篇小说中独树一帜。可以说，罗马叙事文学作品之多、成就之高、叙事之完整、结构之严谨，不仅超越希腊，亦为其他民族文学所难及。¹

对于欧洲中世纪文学，刘建军充分肯定了其叙事艺术。他认为，中世纪叙事文学是多种文明融合的产物，是长篇叙事发展的重要环节与现代长篇小说的基础。²相应地，通常被认为与古代世俗文学断裂的宗教文学，所排斥的也仅是思想内容的世俗性。基督教的一神化体系蕴含以单一情节为中心的结构意味，僧侣对《圣经》故事的改编则促进了片断化结构的成熟。《罗兰之歌》等作品中的“伏笔”、骑士传奇中的“戏胆”、《伊戈尔远征记》里的“扣结”，均成为后世长篇小说的常用笔法。北欧神话的情节与结构也比希腊神话更简洁集中。这些皆为中世纪叙事文学对长篇小说结构发展的贡献，而但丁的《神曲》更是以其对上述结构技法的完美实践，透露出近代长篇小说艺术形式即将出现的曙光。³

薄伽丘的《十日谈》常被归为短篇小说集或故事集，其结构则被称作故事套故事的框架结构。刘建军指出其中的矛盾，若视其为短篇集，便忽略了

1 参见 刘建军：《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34页。

2 参见 刘建军：《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6-37页。

3 参见 刘建军：《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2-44页。

十位青年讲故事者的形象与功能——作者实则通过他们展示了当时人文主义者风采。¹而真正的框架结构应是大故事中套中型故事，中型故事套小故事。《十日谈》中百余故事虽置于同一大框架下，却彼此分量相当、结构地位平等。因此，这些故事实则是按长篇小说布局的，其结构正是流浪汉小说式的变异形态之一——“顶接串珠式”，中心线索不穿过具体故事，仅起连缀引出作用。²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小说式”结构的典型。作品截取1819年末至1820年初的生活断面，以反映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法国社会全景。八条情节线索并行不悖，在上流社会、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暴发户三个场景中交汇。贯穿并统筹这一切的，是拉斯蒂涅向上爬的主线及其性格发展。每个具体故事因与主线关联而在不同的场景中渐次展开，并非独立完整地连续叙述，且分量轻重有别。分支线索人物都围绕拉斯蒂涅存在，功能完成后即退场。此种结构与巴尔扎克自觉的“风俗史”创作意图密不可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综合分析事物的认知方式及相应时空观念的形成，使这种充满戏剧性与长卷风俗画效应的全景描绘成为可能，全知叙事视角则为其提供了便利。³

《模式研究》还广泛涉猎了大量西方长篇小说，其点到为止的评析与开放灵活的思路，既为后续研究提供线索与空间，也避免了理论僵化与个案雷同。对具体作品的结构分析不仅对读者具有指导意义，也对作家创作助益良多，正如孙犁在“关于长篇小说”中指出的那样：“创作长篇小说，感到最困难的，是结构问题”（转引自 刘建军，《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8）。例如，采用“流浪汉小说式”结构，作家需找到一条能贯穿始终的中心情节线索，这通常由主人公的活动构成，因而其性格应不甘寂寞、热衷冒险，并始终保持不变。⁴此外，作者还须储备大量新颖奇特的故事，并依自然、突转、铺垫或交错等方式将其妥帖串联，且可根据资料与读者反馈灵活调整。“巴尔扎克小说式”与“意识流小说式”创作亦各有法则，兹不赘述。

以结构模式演变为核心的《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论》，实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西方文学史，其理论方法与实践具有多重价值，对长篇小说研究、创作及外国文学教学均能发挥积极的示范与指引作用。书中对《堂吉珂德》《高老头》等经典作品的解读，堪称结构研究的范本；对各阶段文学的联系与比较，则使文学史真正成为一个依规律演进的有机整体。时代背景与作品内涵不再机械拼接，作品内容与艺术形式亦不再彼此脱离。

1 参见 刘建军：《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1页。

2 参见 刘建军：《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2-194页。

3 参见 刘建军：《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0-161页。

4 参见 刘建军：《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5页。

结语

《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论》出版十年后,《西方文学的人文景观》于2003年问世。这部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前者的拓展与深化:研究对象从西方长篇小说延伸至整个西方文学,研究视角也从结构模式拓展到了人文景观。作者似乎有意沿着早先建构的西方文学研究骨架,生长出更为丰满的血肉,从而对西方文学予以全景化、立体化的呈现。那些在《模式研究》中因篇幅与架构所限仅点到为止的作品,再次均获得了独立而充分的阐释。在这些近乎独立成章的分析中,先前的结构模式研究成为重要的理论基础,结构分析已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却绝非简单重复既有观点,而是将结构模式与人文精神内涵有机融合,从而使作品解析往往入木三分、见解独到。贯穿两部著作的,正是最初在《模式研究》中奠定的研究理念,以及那种宏观大气、法无定法、有血有肉的学术风格。

这两部著作作为刘建军确立了稳固扎实的文学史观与研究风格,也推动他日后不断从宏观角度开拓新疆域,填补国内西方文学研究的重要空白。换言之,理解了他如何在五十岁前奠定学术地基,便不难明白他为何能在后续研究中屡建开创之功。正是最初二三十年里对西方文学经典的广泛研读,使微观的文本在抽象思维中由点及面、结而成网,同时紧扣精神内核,构建出一个立体的文学世界。这使他能敏锐洞察既有研究中的关键断点,并轻易找到贯通的路径与连接的纽带。《欧洲中世纪文学论稿》与近期出版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文学史》正是此方面的突出成就。¹刘建军的每一部著作都带着一种振臂而呼的气势和唤醒新认知的力量,或者说,他每一次开启新的研究,本身便是受内在崭新认知所驱动的积极性表达。正如在《欧洲中世纪文学论稿》导论中,他直接以标题强调“必须重新评价欧洲中世纪文化与文学”——创新意识仿佛已融入血脉,成为一种本能。然而这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代学者的使命感与责任担当。

总而言之,刘建军的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在浩如烟海的成果中独树一帜,以其观点独到、视野宏阔、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的特点,实现了理论性与可读性的完美结合,为相关领域作出了多重贡献。

Works Cited

陈平原:“论鲁迅的小说类型研究”,《鲁迅研究月刊》9(1991):30-40。

[Chen Pingyuan. “On Lu Xun’s Study of Fiction Genres.” *Lu Xun Research Monthly* 9 (1991): 30-40.]

艾略特·乔等:《小说的艺术》,张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Eliot, George et al. *The Art of Fiction*, translated by Zhang Ling et al.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999.]

¹ 参见刘建军:《欧洲中世纪文学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刘建军:《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文学史》(上、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小说面面观》，杨蔚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

Forster, E. M. *Aspects of the Novel*, translated by Yang Wei.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2.

栗果：“西方长篇小说研究的新收获——评《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论》”，《社会科学战线》4（1995）：279-280。

[Li Guo. "New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Western Novels—A Review of On the Structural Models of Western Novels." *Social Science Front* 4 (1995): 279-280.]

梁启超：《梁启超选集》（上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

[Liang Qichao. *Selected Works of Liang Qichao* Vol. 1.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刘建军：《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文学史》（上、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

[Liu Jianjun. *Byzantium: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Vols. 1-2. Beijing: Peking UP, 2025.]

——：《演进的诗化人学》。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98年。

[—, *Evolving Poetic Humanism*. Changchun: Northeast Normal UP, 1998.]

——：《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 *On the Structural Models of Western Novels*. Changchun: Northeast Normal UP, 1994.]

——：“西方长篇小说的三大结构模式概说”，《东北师大学报》2（1990）：91-96。

[—, "An Overview of the Three Major Structural Models of Western Novels." *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2 (1990): 91-96.]

——：《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 *On the Structural Models of Western Novels*.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P, 2017.]

——：《欧洲中世纪文学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 *A Study of European Medieval Literatur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

Lodge, David. *The Art of Fiction*, translated by Wang Junyan et al. Beijing: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1997.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Lu Xun.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1.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罗伯特·休斯：《文学结构主义》，刘豫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

Scholes, Robert. *Literary Structuralism*, translated by Liu Yu.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8.